

论法国疆界变迁的政治学

刘作奎

内容提要:法国疆界变迁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并具有深刻的政治学含义。本文试以纵向与横向两种视角来考察法国的疆界变迁及政治学含义。一个是作为确保安全的“天然疆界”政策的扩展和变迁(纵向),另一个是作为坚持协调对称的“六角国”思想的变迁和最终成型(横向)。纵向过程反映了法国在对外关系上寻求霸权和安全,这一点是以时间为线索充分展开评述;横向过程反映了法国对内政策上立足提升国民自豪感和归属感,增强民族凝聚力,这一点从文献学的视角充分展开评述。一外一内政策的相互影响,呈现了法国寻求内外兼修、追求大国地位的梦想。

关键词:天然疆界 六角国 内外政策 霸权与安全 民族凝聚力

引子:考察法国疆界变迁历史的两种视角

对法国疆界变迁的考察,国内学术界还没有系统和具体的研究。即使在国外,研究者也是寥寥。不过国外为数不多的学者的研究仍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最著名的学者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庞兹,其论述包括 Norman J. G. Pounds, “The Origins of the Idea of Natural Frontiers in Franc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1, No 2, June 1951; “France and ‘Les Limites Naturelle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4, No 1, March 1954; 另外,从事法国疆界研究的学者还有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6, No 2, Autumn 1969; Peter Sahlins, “Natural Frontiers Revisited: France’s Boundari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 No 5, December 1990, 等等。

这些成果对我们认清法国疆界发展历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将其疆界发展与政治学含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则比较罕见。为此,笔者经过精心搜集西方学术界对这方面研究的史料,总结出纵向与横向两种视角来考察法国的疆界变迁及政治学含义。

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确保安全的“天然疆界”政策的扩展和变迁(纵向),另一个是作为坚持协调对称的“六角国”思想的变迁和最终成型(横向)。纵向过程反映了法国在对外关系上寻求霸权和安全,这一点试以时间为线索充分展开评述;横向过程反映了法国对内政策上立足提升国民自豪感和归属感,增强民族凝聚力,这一点从文献学的视角充分展开评述。这两种视野虽然一纵一横,却是脉络相通,既反映了法国在不同历史时期追求地区和全球霸权,不断追求和重塑大国梦的现实,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的历史及民族本性。

一 天然疆界政策的演变及法国寻求安全和霸权梦

(一) 法国“天然疆界”政策的演进

法国的疆土曾是古代高卢的一部分,古代高卢分外高卢和内高卢。外高卢大致包括今法国、比利时等地;内高卢包括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公元前 58 - 前 51 年,罗马的高卢行省总督恺撒发动了对高卢的战争,征服了整个高卢地区,进而使罗马帝国的疆土扩展到莱茵河西岸、比利牛斯山脉以东、北至不列颠。公元 2 世纪末,罗马帝国在高卢的统治开始衰弱,到了 3 世纪,日耳曼人纷纷入侵高卢,并逐渐把高卢分割。随后,高卢境内的日耳曼部落相继建立了墨洛温王朝(公元 481 - 751 年)和加洛林王朝(公元 751 - 987 年)。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后改称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大帝进行了大规模领土扩张,东部抵达易北河和多瑙河,西部临大西洋,西南部伸到西班牙,北部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南部至意大利中部。

公元 843 年,查理曼大帝统治的帝国被他的三个孙子缔约三分天下,居长的罗退尔分得中央之地,从北边的比利时南下卢森堡、瑞士直到意大利,他的两个兄弟路易和查理分别得其东西之地,东边路易所得大致等于今之德国,西边查理所得大致等于今之法国(西班牙当时仍归伊斯兰教王朝统治)。在王国分裂过

郭华榕、徐天新主编:《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 页。

程中,其边界问题并没有进行确切地划分,这为以后法国同其他国家的边界纠纷埋下了隐患。而从帝国分裂到16世纪前,“天然疆界”政策在法国人心中只是一种模糊的意识。当时法国历代统治者只是下意识地向外扩张领土,来保证国土安全。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威廉·乔丹所述说的:“法国曾有过征服天然疆界的政策,但把法国推向‘天然疆界’的概念,在法国大革命前,只是几个对法国外交政策影响不大的思想家的幻想罢了。”进入16世纪后,法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日益要求扩展国家的实力和版图。17世纪初,法国国王佛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法国的四周均被哈布斯堡的领土所包围,法国政府采取一切手段扩展边界,以冲破这种包围。此时的法国“天然疆界”观念虽不是太明晰,但有了明确的扩展意识:即尽量拒敌于国门之外更远的地方,让入侵者无法对法国边界进行侵犯。至于这个“天然疆界”的界线应划到哪里,还没有成熟的想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从这时期开始,法国历代君主都意图恢复古代高卢的边界:即向东推到莱茵河,向南推到阿尔卑斯山、地中海和比利牛斯山,向西推到大西洋。

佛朗索瓦一世的继任国王亨利二世继承了前者的政策,开始向东部边界扩展,并获得了成功。1618年,欧洲30年战争爆发,当时著名的政治家黎塞留主教为法国设计了最终的战争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法国的“天然疆界”:除把比利牛斯山脉作为法、西永久边界外,还应该把法国边界向东推进至莱茵河,特别是要控制梅兹、洛林和斯特拉斯堡,因为这些地方有利于法国的防御而且可以作为攻击德意志的重要门户。这时法国对“天然疆界”的要求已经有了大致的界线,“天然疆界”概念日益清晰。而黎塞留也明确提出了法国重建“新高卢”的雄心,他说:“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为高卢人找回高卢人国王,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一切地方建立

查理曼帝国分裂后领土变动的具体情况见 Norman J. Pounds,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Natural Frontiers in France”。

W. M. Jordan,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 problems 1919 - 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 170.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郭华榕、徐天新主编:《欧洲的分与合》,第128页。

K. J. Holsti, *Peace and War: A med Conflicts and Intemational Order 1648 - 1989*,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0.

新高卢。”

黎塞留通过 30 年战争得以进一步巩固法国安全,天然疆界也得到进一步扩展。此后,他的继任者继续通过击败奥地利和西班牙来实现法国的“天然疆界”。1661 年,“太阳王 路易十四亲政,继续开拓疆土。这一时期“太阳王 想尽各种手段,使法国“在和平时期征服的土地比路易十四以前的十个国王通过战争征服的土地还多”。不过,法国的过度扩张也耗尽了国力,最终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国、荷兰、普鲁士等国签订《乌特勒支和约》,退还和割让了许多领土,“天然疆界 政策不得不暂时搁置。

1789 年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旧的君主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大陆封建国家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纷纷前来干涉革命。1793 年雅各宾派专政后,革命领袖们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展领土,一方面转移国内对雅各宾派专政的不满,一方面继续扩充版图,阻挡欧洲封建势力的进攻,维护国家的安全。在法国军队进入瓦尔密和美茵茨后,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争议:一旦这些领土被占领了,应该对它们采取什么措施呢?应该采取什么保证措施来避免它们重新沦入仇视革命的旧统治者手中呢?难道通过吞并达到目的?但革命的法国已经放弃征服,许多领导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皮尔 (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拉扎尔·卡诺 (Lazare Nicolas Camot)、卢谢·德穆兰 (Lucie Smplice Desmouline)——都反对吞并政策。这时候,革命领袖乔治·雅克·丹东 (Georges Jacques Danton) 综合各方观点,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共和国的边界是天然划定的。我们应该达到地平线上所有四个角落,以莱茵为方向,以海洋为方向,以阿尔卑斯为方向。共和国必须达到这些边界,没有人为的力量能阻止我们到达那里。”于是,“天然疆界”成了各方都普遍接受的办法,并由此打上革命的烙印而深入人心。历史学家乔丹说:“天然疆界作为一种革命传统由此孕育……因此,法国关于莱茵等的‘天然疆界’原则并不是君主政策的产物,而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对此,历史学家彼得·萨赫林斯也曾专门论述过 17 世纪以后法国的外交政策,法国大革命是其重点论述的内容之一。他在文中说:

[苏]波将金:《外交史》第 1 卷(上),史源译,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345 页。

[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72 - 173 页。

Georges Jacques Danton, *Discours*, Paris: Au siège de la société Com éy & cie, 1920,

p. 268

W. M. Jordan,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 problems 1919 - 1939*, pp. 170 - 171.

“法国的‘天然疆界’思想在法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和学者们对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研究的专著中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话题。正如法国革命史学家艾伯特·索雷尔(A. lbert Sorel)在1885年写道:这一思想就是‘地理环境决定法国政策’:从16世纪开始,法国就持久和延续不断地向大西洋、莱茵、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扩张。‘这些边界是天然划定的’,黎塞留这么说过,法国革命家丹东也说这是‘自然所分割的’。”

有了上述的明确指导原则后,革命政权通过武力将法国边界向尼德兰、莱茵和北意大利全面推进。不久,法国宣布它要实现新的“天然疆界”,即获取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以及莱茵河以内所有的领土。但是不久,法国内部出现了政治动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扩张的进程。

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掌权,他的对外扩张野心比任何一个前辈都大,他要进一步实现法国更为广阔的“天然疆界”:永久兼并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领土。1802年法国与相关欧洲国家缔结了《亚眠条约》,实现了法国上述的天然疆界。获得了这些土地并没有使拿破仑满足,反而激发了他更大的扩张欲望,他要越过“天然疆界”来保护法国的“天然疆界”。由于法国无限制地超越其“天然疆界”,遭到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的抵抗,并最终击败了拿破仑。法国疆土又大致恢复到《亚眠条约》前的范围。此后,法国安全问题频频告急,自己的“天然疆界”不断遭到新兴统一国家德国的挑战和侵犯。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其边界安全愈益受到德国的威胁。此后半个多世纪,这种威胁和困扰一直没有消失。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法国联合英国和俄国在一战中击败了德国,安全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法国在战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力资源与工业能力——作为近代国家战争潜力的基本要素,法国与德国相比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处于劣势。一次大战法国的“惨胜”没有改变两国这种战争潜力要素对比的天平。德国虽然受到了割地、赔款和解除军备等苛刻条款的捆绑,但其人力和工业优势的基础却未受到触动,一

Peter Sahlins, “Natural Frontiers Revisited: France’s Boundaries since Seven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 December 1990, p. 1423.

McKay and Scott,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1648 - 1815*,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82.

David Lloyd George, *Th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London: Gollancz, Vol 1, 1938, p. 402.

旦重整旗鼓,必将构成对法国安全的严重威胁。正如史学家菲利普·贝尔深刻指出的:法国外交政策有时曾试图与德国寻求协调,有时想压垮它,这表明法国对德国采取的政策是灵活的。“但在有一点上它是无法灵活的:法国的地理状况是无法变更的。1919年以后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状态,英国也同样想这么做,以逃避给它带来灾难的欧洲大陆义务。因为,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海峡即使不算宽,也足以保证英国全身而退。而法国却不能有这种想法:法国紧邻德国,时刻受到重新复兴的德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威胁,法国因此需要安全。”

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阿诺德·沃尔夫斯在总结一战结束后法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时说:自一战以来,“安全”成为法国外交政策的主旨。至少,这是政治家们一致和持续声称的。这个词语本身不能说明法国政策的特殊性,毕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寻求和平、稳定和安全。当法国谈到他希望得到“针对德国入侵的安全保证”时,它的具体含义才变得明显。法国对德国会发动一场新的战争的恐惧愈演愈烈,《凡尔赛条约》也没有缓解这种恐惧。其结果是战后20年欧洲国家因为法国的安全问题一直争吵不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被德国侵占,这种争吵才在炮灰中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淡出。

二战刚刚结束,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就表示出肢解和削弱德国的强烈要求,主张鲁尔和莱茵兰地区国际化,萨尔与德国分离,经济上向德国索取高额赔偿。法国希望通过彻底削弱德国来维护“天然疆界”,但它没有劝说成盟友英

法国人口在1921年是3920万,1926年是4020万,1931年是4120万。一战以来的15年,德国人口从1919年的5990万增加到1925年的6320万,到1933年是6600万,参见B. 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 - 1975*,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0, p. 20。德国工业基础在战争中没有遭到彻底破坏,还保留了大量工业部门和就业人口。以1925年为例,法国有390万男人和200万妇女从事手工业和工业生产,德国有740万男人和280万妇女从事手工业和工业生产,参见B. R. Mitchell, op. cit., p. 20, 155, 156。

P. M. H. Bell, *France and Britain 1900 - 1940: Entente and Estrang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6, p. 133。

Arnold Wolfers,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 Conflicting Strategies of Peace since Versailles*, London: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0, p. 201。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英、法、德、意等相关大国曾缔结了《洛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等一系列条约,部分解决了法国的领土安全问题,但仍旧留下大量的隐患。随着30年代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法国的安全再度成为焦点。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美通过分裂德国或者至少分离德国最大的军事和工业中心鲁尔来获得安全保证。英国艾德礼政府外交大臣贝文指出：“英国政府一直认为分裂德国只能造成一场民族统一运动，促成一个动荡而不是和平的德国，并培育了一种战争精神。”而美国杜鲁门政府则想让德国繁荣和强大起来对抗苏联。随着冷战的展开，法国逐渐认识到当时不可调和的矛盾已变成美苏两大阵营的矛盾，而不是存在于法德之间。其实，早在二战进行当中，一些法国有识之士，如让·莫内、罗伯特·马若兰（Robert Marjolin）、罗伯特·舒曼等人就认为通过制裁德国来维护安全并不明智，法国安全的出路在于通过重要经济部门与德国联成一体、重建一个繁荣的欧洲来解决，或者说“把法德和解作为法国安全的支柱（buttress）”，把棘手的边界问题变成法德共同维护的对象。

1945年夏，法国著名政治家莫内指出：在法国安全问题上，“德国问题是中心问题”，并提出建立某种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权力机构，让各国共同参与管理鲁尔的煤炭资源，这就可以“建立一个巨大的欧洲市场，防止各种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这是因为，鲁尔煤炭不仅是德国工业的支柱，也是法国洛林等钢铁基地的主要依靠。为了防止德国利用煤炭资源重新崛起，也为了保证法国煤炭正常供应，煤炭被选择为欧洲共管。钢铁是军备生产的基本材料，实行共管，无疑可以有效限制德国军备生产。这既满足了法国经济振兴发展的需要，又从政治上满足了限制德国的心理要求。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在法国政府的批准下，于当日下午4时宣布：“法国政府提议将法德两国的煤炭生产置于共同的高级机构的管理之下，这一机构同时向欧洲其他国家开放。煤钢联营能够为经济发展迅速建立起共同的基础，这是走向欧洲联合的第一步。”“舒曼计划”发表后，德国作出积极的回应，欧洲一体化因而迅速起步，进而彻底消除了“法德旧时代的敌对关系”，而且使“两国之间的战争”不但是不

Edmund Dell, *The Schuman Plan and the British Abdication of Leadership in Europ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

ibid .

ibid , p. 8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第255页。

根据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第255-256页资料整理。

F. Willis, *France,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1945 - 1963*,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80

可想象的,而且从物质上讲也是不可能的。这样,法国通过融德国于欧洲、法德和解作为维护疆界安全的“新办法”获得了成功。此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逐步加深,法国的“天然疆界”政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政治学含义——“天然疆界”政策背景下的安全和霸权

(1)“天然疆界”政策的背景:法国边界的开放性导致了众多的安全隐患。

法国地处欧洲大陆西部,南部偏东濒地中海;偏西沿比利牛斯山与西班牙交界;由北部至东南部分别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接壤。可以说法国大部分国境线都暴露在许多曾经强大的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面前,它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都疲于应付边境也就是国家安全问题。尤其是东北地区,即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相连的部分,其间地势平缓,无任何天然障碍,来往畅通无阻。便利的自然环境虽有利法国与邻国人民的相互交往,但也为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人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高卢,继而开始了对高卢长达500年的统治。到中世纪匈奴强盛的时代,各路蛮族侵略者曾经越过莱茵河侵入法国国土约达30次之多。更有甚者是到了近代,德国人在一个世纪内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1918年)让巴黎人民听到了自己大炮的轰鸣,他们还三次让法国人亲眼目睹自己的军队穿过巴黎的街道。无怪乎法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勒贝尔·德芒戎说:“法国肯定是欧洲各国中最少与世隔绝、最不‘闭塞’的国家之一。”一战后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的查里斯·戴高乐在阻止法国政府修建马奇诺防线时,就曾向当局指出法国领土的“弊端”,他在《建立职业军》这部著作中分析说: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缺乏天然屏障保护,几乎是“一马平川”,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敞开着大门,更是无险可守。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深重历史灾难使法国历代统治者都追求一种能够彻底维护法国本土安全的政策,而无限扩展法国领土纵深的“天然疆界”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John A. McKesson, “The Schuman Pl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7, No 1, March 1952, P. 19.

[法] 菲利普·潘什梅尔著:《法国》上册,叶闻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Charles de Gaulle, *Vers l'ame éternelle*: Beyrouth: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1971, p. 14.

(2)法国为了安全而寻求“天然疆界”的保护,并逐渐演化为寻求霸权。

地理位置的完全开放性造成法国屡屡遭受侵犯,促使法国在欧陆致力于寻求一种维护本土安全与稳定的“天然疆界”——尽量把国家边界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以便为保卫法国本土获得更多的纵深,同时使这一边界观念作为一种传统的外交理念深入人心。这成为法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目标。如前所述,法国“天然疆界”思想历经多年变化,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终于形成一种稳定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的形成正是法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现实的历史需要的反映。

获得安全的途径是扩充领土,法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扩张也的确缓解了法国的安全压力。在领土扩张过程中,法国安全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后,又不断追求更大范围内的安全。比如在拿破仑时代,其扩张表面上是寻求安全,但实质上是越过“天然疆界”去寻求新的“天然疆界”,进而演变到追求法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霸权。列宁对此曾深刻地指出:“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发生了“法兰西的民族战争”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的过程。在许多欧洲国家看来,“天然疆界”政策已成为法国外交政策的一把标尺。法国人的看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法国对“天然疆界”过于执着的追求往往变质成侵略和霸权。早在19世纪初,英国资深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时常站出来提醒英国人民说:法国的势力已突破它的“天然疆界”——即以居民语言为界限的边界,这说明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维持欧洲“均势”,而是要称霸整个欧洲。史学家安东尼·亚当斯维特更是深刻地指出,“对法国来说,安全和霸权是同义词……只有霸权才能确保持久的安全。”

(3)“天然疆界”的政治学含义。

作为在漫长历史中经历过强盛和衰弱的法国来说,它深知国际政治的现实

庞兹对法国“天然疆界”政策颇有研究,曾在1951年和1954年先后发表了有关法国天然疆界思想起源和从17到20世纪的法国天然疆界问题的两篇文章(见篇首注1)。在后一篇文章中,庞兹试图从思想文化等角度来论述法国当时扩张的合理性。在文章中他提到孟德斯鸠、洛克、卢梭都论述了通过扩张来保卫安全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或称之为“天然的使命”。到大革命时期这种思想变成了鲜活的现实而为法国人所承认和追求。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50页。

辛晓谋、官少鹏编著:《外交家》,晨光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Alan Sharp and Glyn Stone, *Anglo-Frenc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ivalry and coope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22.

游戏规则,也深深懂得现实外交的意义。法国许多外交家们崇尚国家实力,坚持扩张有理。这种思想经过黎塞留、路易十四、拿破仑等人的强化后,形成完整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并引发了法国历史上最为狂热的寻求“天然疆界”的历史时期。马基雅维利曾认为,所有的共和国和君主国都在彼此竞争敌对的状态中生存,人们永远不会满足于“靠自己的资源来生活”,他们总是倾向于“试图统治他人”,因此,“一个共和国不可能平静无事长期享受其政治自由”。为此,一国必须采取以攻为守的扩张主义政策,这样既能保证自己的祖国“能够防卫自己免于他人袭击,又可粉碎那些阻止他兴盛强大的任何人的企图”。马氏的许多思想在法国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但他的“扩张安全论”对法国统治者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为他们所采用。

作为当代西方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代表的米尔斯海默在回顾西方大国几百年的外交时总结出国际政治的真谛:“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止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的唯一大国。他尤其强调,“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因为再没有其他国家能严重威胁此类巨无霸。”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一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引用黎塞留的话:“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见。”法国由于边界的开放性,安全环境和生存状况一直饱受困扰,为了寻求绝对的安全,它也无法背弃在追求“天然疆界”过程中寻求霸权的法则,即它必须不断以征服者或霸主的身份来获得最大的安全。

米尔斯海默指出:“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

王福春、张学斌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5 - 66、86 - 87页。

[意]马基雅维利:《君王论》,惠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51页。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 - 4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 46页。

畏惧 (fear)、自助 (self-help) 和权力最大化 (power maximization)。”法国就是这种写照,它之所以多次采取扩充边界的行动,是因为它“缺乏一个使受威胁的国家向其寻求帮助的中央权威,因此,国家彼此间具有更大的防范动机。另外,除了有第三方的可能利己因素,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惩罚侵略者。因为有时很难遏止潜在的侵略者,所以国家很不信任他国,而是做好与它们战争的准备”。米氏的观点总结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典型现象和观点,也揭示了“天然疆界”政策的本质: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家间为了寻求最大的安全和利益,会通过扩张和霸权的行动来实现。这一观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十分精辟和准确的,法国边界扩张这段历史就是对其观点的生动注解。

二 法国“六角国”思想的文献学记载

(一) 法国“六角国”观念的演进

“六角国”从20世纪50、60年代至今作为“法国”的代名词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但是法国的“六角国”思想却有一段复杂变迁的历史,这段历史之长和其中变化的内容之多令人吃惊。早在欧洲历史上的所谓古典时代,人们就认为大自然特别眷顾高卢,但始终没有出现有关高卢地理的经典性地理学论述。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地理疆界变迁不定以及没有明确的边界,使得在中世纪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无法考察法国的特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

随着法国历史疆界的演进,以及在演进过程中其疆界始终呈现了一种相对的匀称性,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地缘政治学者史密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4页。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5页。

有关“六角国”思想的记载文献极少,故笔者基本上参考的是史密斯的论文,他对此问题做了精心的总结。参见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在下面引述的论文中,凡涉及到20世纪之前出版的书,参考内容都出自史密斯的论文。但笔者还是在某些地方保留了原注,因为通过网络途径可以查到原文的记载,特此说明。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39.

西方(欧洲)古典时代应从公元前1000年代初古希腊文化算起,还要加上罗马古代共和国和帝国时期,而结束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或延长至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公元527年—公元565年)时代。这时因蛮族入侵,结束了欧洲古典文化,所以西方(欧洲)古典时代,是介于先后两次大规模蛮族入侵的历史事变之间。

斯所说：“传统的、切实可行的、最明了地描述地理区域的办法是依照疆域四周各点连成的长度和宽度。不过这种分法对像意大利和瑞士这样的国家来说就有点尴尬，因为它们边界线天生就是不规则的，这就会使它们的领土在逻辑上看是缩小了。而对法国来说就很容易丈量，因为它的边界线是规则的。因此，在17—18世纪，毫无例外地，地理学家们首次以靠近法国的东西南北四边为边界线来描述它的形体，然后给出的长度是从北海某点和地中海某点，它的宽度是从布列塔尼(Brittany)顶端到德国。”皮埃尔·杜瓦尔(Pierre Duval)在《地理王国》(g ographe du roi)中写道，根据费朗·斯彭斯(Ferrand Spence, 17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法语翻译家)的《地理世界》(Geographis Universalis)英译本的说法：“法国长度有200里格，宽度也有这么大。由于法国“协调的形体”而使后来的地理学家以几何形体的概念来称呼法国。

其实，早在1616年雅克·丰特尼(Jacques de Fonteny)就曾宣布“法国边界是一个圆形边界国家。法国边界是个圆？这种思想出现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日期，而不是它的结论。因为，在有文献的记载中，它最早提出法国疆域是一个逻辑对称形体。此后关于法国各种形状的描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1657年，彼得·黑林(Peter Heylyn)指出法国的形状近乎正方形，每一个边长度约为600英里，后来，他又给出更为详细的尺度660和570英里。到了18世纪以后，仍有人坚持法国的形体为正方形，而且大多数人复制了苏格兰历史地理学家托马斯·萨尔蒙(Thomas Salmon)在《近代史》(Modern History)中的说法：“如果不考虑布列塔尼比起王国其他地区多伸出一百英里，法国这种形状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39.

League, 旧式长度单位, 相当于3英里、5公里或3海里。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41.

文献当中对法国疆域是圆形的记载非常少，除了上述提到的外，还有一本出现于1940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三个多世纪，参见 Samuel Van Valkenburg, *Element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Incorporation of Prentice-Hall, 1940, pp. 30 - 31.

Peter Heylyn, *Cosmographie* (2nd edition), London: Printed for Philip Chetwind, anno Dom, 1657, p. 173. 有关法国是正方形的记载文献较多，多集中在17-19世纪。依照 Nathaniel B. Smith 的统计共有15本，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George Ponzan, *La Science de l'homme de qualit * Piemonte: Turin, 1684, p. 182; Charles W. Morse, *The Diamond Atlas*, New York: Morse and Gaston, 1860, p. 143.

几乎是正方形的,长度和宽度近于相等,也就是说大约是540英里。”

但是正方形在18世纪拥有较大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坚持的结果,他们为了羞辱死敌法国人才这么称呼法国的。因为以当时欧洲人的传统看来,正方形在形状上既不具有艺术性也不尊贵,缺乏像其他一些几何形状具有吸引人的含蓄意义。此外,北部法国并未形成一条直线,无法认为是一种规则的正方形。由于法国人的反对以及在形体上并不接近于真实的法国的形状,正方形思想逐渐失去了市场,惟有盎格鲁—萨克逊人把这个称呼拖到1879年,在这一年第9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最后一次提到法国疆界是正方形。

以上都是法国域外人士对法国疆界形状的看法,就法国方面而言,从18世纪开始法国人就一直搜寻一种更准确、富有民族特色、艺术性的和令人满意的形体来描述法国。1757年,著名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不仅对法国疆界四边的长度和宽度(230和220里格)进行了测量,而且对两个对角线也作了测量(250和210里格),尽管百科全书派没有进一步勘测,但通过已获得的数据百科全书派发现法国边界的特点是多边而不是四边。

1789年之后,法国因为进行领土扩张正式出现了“天然疆界”的思想,但领土扩张的结果使法国变成一个几乎不规则的领土聚合体。随后25年,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法国的新旧边界上。1795年,伦敦第二版《简明地理学词典》(A Compendious Geographical Dictionary)在描述法国时,提到了北、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六个边。在巴黎,法国人埃尔班·阿尔(Herbin de Halle)编辑的词典中也把法国作出了上述的划分。虽然这两本著作并未承认法国领土是相等的六边,但两者都包含了六角国思想的萌芽。

法国的“新形象”正要形成的时候,却被1770年《法兰西大辞海》中的解释干扰了一下,该书描述到“法国的形状是五角形”——直到随后半个多世纪才被

Thomas Salmon, *Modern History* (II), London: Longman, 1737, p. 473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在编纂《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形成的派别。《百科全书》注编是狄德罗。参加撰稿的有140余人,他们哲学观点不同,宗教信仰不一。百科全书派的核心是以狄德罗为首的唯物论者,他们反对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向往合理的社会,认为迷信、成见、愚昧无知是人类的大敌,主张一切制度和观念要在理性的审判庭上受到批判和衡量。他们推崇机械工艺,孕育了资产阶级务实谋利的精神。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42 - 143

Herbin de Halle, *Statistiqu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de la France*, Paris: A. Bertrand, Vol. I, 1803, p. 1.

忘却掉。1793年法兰西共和国把原来的四个边界增加到五个,即多了东北部,与荷兰相接的地方。据当时的解释,虽然法国疆界的最大长度约是212里格,最大宽度约是210里格,但是它位于查伦特(Charente)的出口和阿尔卑斯之间的长度不止140里格宽——几乎不是一个正方形。随后在1836和1866年间,法国人塞巴斯蒂安·拉瓦利(Théophile Sébastien Lavallée)在它出版的著名的《自然地理》(Géographie physique)中宣布:法国是“五角形”,它的各边从225到900英里不等,然后描述了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它包括了莱茵至阿尔卑斯900英里长的第五个边。五角形这种想法并没有获得成功。五个边和众多崎岖不平的界面并不符合法国人崇尚对称的性格。更为严重的是,从地理学意义上讲,它无法超越正方形的观念。

五角形很快偃旗息鼓,法国人随后曾在六角国和八角国之间做出过抉择。这种抉择表明了直到19世纪下半叶,对于寻求地理上的几何图形形状,法国仍未形成稳定的倾向。

第一部描写法国为六角国的著作于1795年在德国出版,作者是德国人埃贝哈德·齐默尔曼(Eberhard Zimmernann)。他对最远六个点连成的三条对角线进行了测量:Ypres和Ceret, Landau和Pic du Midi, Passage du Four和Cap Roux。齐默尔曼说这三个对角线在长度上的差别仅在27里格,并且在靠近Clemont-Ferrand的地方聚合。这种法国六角国先锋式的阐述持续了35年。1830年,一本比利时字典《通用地理学词典》(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universel)是这样描述法国的:它的各角分别靠近敦刻尔克、Pointe de Saint-Michel, Bidassoa的出口、Cap de Cerbères, Var以及Lauter与莱茵的汇合点。这些角中只有第五个角与今天的不同,但先例因而确定下来。在1855-1864年近十年中有不少于七本著作多次提到六角国观念。

J. Panckoucke, *Le Grand Vocabulaire François* (2nd edition), Paris: C. Panckoucke: Vol. XI, 1770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43.

五角形的历史记载也不多,根据史密斯的统计,共有7本书提到,参见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44, 153

Eberhard Zimmernann, *Frankreich und die Freistaaten von Nordamerika*, Leipzig: In der Weygandschen buchhandlung, 1795, pp. 13 - 14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45.

但是就在六角国思想逐渐孕育过程中,法国又被八角国的思想打断了。它的始作俑者就是法国著名地理学家埃利兹·雷克吕(Elis e Reclus),他的八角国的见解在法国著名文法学家、辞典编纂人皮埃尔·拉鲁斯(Pierre Larousse)于1872年出版的《19世纪通用大辞典》中被引用过。后来八角国的思想也在一些论著中偶尔出现。不过八角国基本上没有在法国人心中留下印记。

1873年,著名的法国地理学家埃米尔·勒瓦瑟(Emile Levasseur)在其地理学著作中把法国正式描述为一个六角国。几年后,《法国地理》(G ographie de la France)等地理学著述也称赞了六角形的天然完美,三个边靠海洋,三个边靠陆地。由勒瓦瑟撰写序言的《法国图册》(Petit Atlas de la France)是第一本详细描述法国六角形状的著作。到1900年,六角国在思想上的优势地位被确定下来。有12本法国和3本外国著作,包括学校课本、地理学书、地图册,以及法英两国的百科全书(法国大百科全书和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都采用了六角国的概念。

在两战之间,六角国很少被人提及了。但是在1950年代,“六角国”在学校课本、字典、百科全书、历史著作中又传播开来。法国人皮埃尔·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提醒他的同胞说:六角国是历史所能创造的众多形体中唯一适合法国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六角国梦幻”。在文中他第一次把六角形作为标题来指代法国,强调了是历史的塑造和法国人民的想像力,而不是任何自然的命运促成了六角国,而且“这六个角几乎都是规则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六角国形象日益稳固。法国人珀蒂·拉鲁斯(Petit

Pierre Larouss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dix-neuvi e si cle*, Paris: Larousse, 1872. 在该书有关“法国”的词条中,皮埃尔·拉鲁斯引用了埃利兹·雷克吕八角国的说法,但没有确切地指出资料的来源。

八角国的记载也不是很多,据史密斯的统计有10本书,大多出现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中期。参见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46

随后在19世纪末,法国和其他国家陆续出现了许多著作来介绍六角国,包括: Charles C. Savage, *The World*, New York: Phelps, Fanning, 1853, p. 313; Maurice Block,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Paris: Amyot, I, 1860.

此统计是采用了史密斯的说法,参见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47.

Pierre Gaxotte, “L’illusion de l’hexagone”, *Revue de Paris*, September 1956, pp. 3 - 15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p. 149 - 150.

Larousse)在 1959年曾说过:“总体比较而言,法国的形体是规则的六角形。”在法国人心目中,它们的六角达到了绝对的完美。从 1950年到现在,事实上法国涉及“六角国”的话题越来越多。戴高乐在法国执政时期对“六角国”的形象进行了广泛地宣传,深深打上了法兰西民族的烙印。1966年 12月 31日出版的《新约克人》杂志在一篇《来自巴黎的信》的文章中作了下列评论:“戴高乐政府已经开始张贴宣传画和象征物,给予了法国新的富有知识气息的口号‘六角国’——指的是在地图上的形状。”至此,“六角国”经过官方的确认和宣传,在法国取得了正统地位。

(二)“六角国”的政治学含义

(1)法国形状似六角,这是“六角国”观念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根本条件。法国疆界在历史不同时期经历了较大的变动,但最终停留在六角形这个形体上,这是法国“六角国”思想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至于它进一步的深刻含义,则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等进一步发挥想像力而已。

(2)“六角国”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和政治烙印,反映了法兰西民族的一些唯美本性。二战后,人们可以在巴黎街头看到它引人注目的形象,它靠海的三个边是蓝色的,靠陆地的三个边是红色的,它象征了国家的力量、繁荣和统一。它六边的数量比起五角形的五边更有感召力。它的南北轴线与其他各条对角线相等,任何连接相应点的线都把法国平分为两半,它的所有角都是相等的。这些都反映了法国喜欢协调与对称的审美本性。

(3)“六角国”体现了法国寻求内在的和谐与强大。六角形的天然属性使它与其他多角形区分开来:六角形恰到好处地弥补了法国疆界的各种缺陷,与周边各国疆土能够毫无空隙地缝合在一起,这是天然赋予的形状,像蜂房、岩柱、雪花。这种形状通常被比喻为是法国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而这种“家庭细胞”的力量,通过六角形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六角形成为法国整体外在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50

New Yorker's, December 31, 1966, p. 67. 此后“六角国”被许多著作广泛宣传。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50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52

1964年劳伦斯·维利(Laurence Wylie)在哈佛大学讲课时,曾对六角形的客观含义作过讲解,这可在斯坦利·霍夫曼的《寻找法国》一书中看到他的评论,标题是“人们赖以生活的象征”。见 Stanley Hoffman, *In Search of Fran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27.

形象与内部社会单元的和谐统一。

法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法国坐落在陆地上一个独特的位置:位于北半球的中心。它形体紧凑,既不是太长,也不是太宽;既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是介于庞然大物的俄国和体型较小的比荷卢之间的完美结合。通过连接六个点法国很容易被勾画出来,从它的地理中心到最远点,代表了六个主要城市。简言之,从六角形的描述中,人们认为法国领土形状是规则的、易于描画的(drawable)、有层次的、适合居住的、独一无二的。法国舆论也多次宣传法国的领土是“自然的眷顾”以及“法国和谐的形体”。通过对六角国的神秘描述,法国政府向公民们灌输了一种美妙的归属感,增加了内部的凝聚力。

还有更为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六角国”能够战胜其他各种几何形体的描述,首要的是它相对准确地呼应了法国的政治现实。它实际上包括了法国所有领土(八角国排除法国东部很多领土,五角国排除南部法国许多领土,正方形排除了布列塔尼和其他突出的部分),而且事实上使法国比实际看起来更大一些,因为它包含了许多海域以及和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的一些领土,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法国的大国心态。而对六角国的广泛宣传,从内心中反映了法国不断追求大国地位的梦想。

三 “天然疆界”与“六角国”相互倚重

“六角国”与“天然疆界”政策可以互相倚重,从历史和观念上反映了法国追求“内外兼修”,并不断塑造与追求大国的梦想。对“六角国”来说,加强内部凝聚力并塑造大国形象、自豪感是与“天然疆界”的安全和霸权诉求并行不悖的,两者的共同目标和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重塑法国的“大国形象”。从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来看,“六角国”的内部聚合有利于扩展“天然疆界”。而对“天然疆界”的扩展又可以不断地重塑法国的良好形体,既可维护安全,又保证了国内的稳定,可谓相辅相成。知名外交政策研究专家、法国人巴蒂斯特·迪罗塞尔曾对

政府对本国地理位置的推崇向来是推行生存环境优越论、政治教化和增强民族自豪感、认同感的手段之一,比如英国的“岛国情结”,美国的“上帝赐予的净土”,中国的“中央之国”、“神州大地”观念等等。

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p. 148

此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他认为法国外交政策分“对内”(introversive)和“对外”(extroversive)两种模式,法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追求权力、安全和大国地位,对内政策的目标是创造社会财富和增加社会凝聚力。他认为这两者的关系是:对内政策是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而对外政策的作用是避免法国在取得对内政策目标过程中遭到外部危机的影响和干预。迪罗塞尔实际上是承认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早在黎塞留主政时代,他就力主内外兼修。黎塞留主教在提到法国的最高国家利益时说:法国的国内政策是维护社会安定,政治团结,没有独立于国王的权威;对外政策则是促使国家强大,没有威胁法国安全的敌人。拿破仑也宣扬过这种想法,他说:“法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地,以及居民的能力和智慧,是欧洲国家的仲裁者……我有雄心要做到把欧洲所有的巨大利益融合在一起,如同对法国各派所已经做到的那样——成为各族人民及其君主之间的仲裁者。”直到戴高乐时期,这种思想的光芒仍然没有泯灭。当时戴高乐的全部外交政策(或称“戴高乐主义”)都是以对外塑造法国大国形象,对内强调法国的“伟大”和“历史使命”展开的。他曾经说过:“在任何时代,法国出于天性要完成‘上帝的伟业’,传播自由思想,做人类的旗手。”戴高乐思想有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点,他的这种特点一直影响着现在的法国,比如他的继任者蓬皮杜被称之为“现实的戴高乐主义”,德斯坦被称之为“新潮的戴高乐主义”,密特朗则被称之为“社会式的戴高乐主义”,而希拉克采取的外交干脆被称为“戴高乐主义”的复兴。

(作者简介: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责任编辑:宋晓敏)

Jean-Baptiste Duroselle, “Changes in French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 in Stanley Hoffmann, *In Search of France*, p. 306

Henry B. Hill, *The Political Testament of Cardinal Richelieu*, Wisconsin: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45

王养冲:《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540页。

王福春、张学斌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第 301页。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01页。

具体内容参见王福春、张学斌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第 305页。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3 No. 6 December 2005

ARTICLES

1 World Politics in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ic Wars

SHI Yino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brought France extraordinarily mighty power and an overall external objective shaped by a revolutionary universalistic ideology, while Napoleon conquered and controlled almost the whole Europe by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novations based on th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derwent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that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 both in objective and strategy. However, the mighty Napoleonic Empire was finally destroyed by three major mechanisms in world politics: the flanking powers, the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waged their decisive struggle against the Continental hegemony; the so-called "insular principle" (sea power) overcame once again the "continental principle" (land power) aimed to dominate Europe; and, the French conquest brought about the widespread anti-French nationalism, thereby made the modern nationalism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ad provided Napoleon with an essential power a major negation of his Empire. The Napoleonic Wars led power move to and accumulate in the east and west margins of Europe, which resulted in a big leap in a centuries-long historic proces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traditional center and ascendancy of the flanking powers.

14 Politics in the Transitions of French Frontiers

LU Zuokui

The transition of French frontiers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of profou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Based on relevant referen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ition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rom both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aspects. There are two main focuses of the paper, one is the enlargement and evolution of "natural frontiers" that insured the safety (the transverse), and the other is the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of "hexagon" that insisted on harmony and symmetry (the longitudinal). It argues that, while the transverse aspect reflects the efforts of France to

seek hegemony and security in its foreign relations (sequence's clue), the longitudinal aspect reflects its efforts to promot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hesion of internal policy (literature's clue). And these efforts show that France is forging its interior and exterior frontiers consistently and simultaneously to realize its dream to become a great power

32 Political Culture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Transition of Germa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WANG Mingfang

Like individual person, every nation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 decided by its specific political culture. Sinc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penetration is tremendous, it is of great difficulty for a nation to transform. Although the long history of Germany was marked and deeply stained by notorious militarism, its culture has been stamped as pacifism-orient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It has simultaneously changed into a stable and mature western democrac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litar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and argues that the main cau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 nation from militaristic country in the past to pacifistic one at present is the successful shift of the nation's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culture.

41 Application of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in ECJ Antidumping Cases

HAN Xiuli

There were no provisions on the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in the early constituent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three Communities. It is through the case-law of the ECJ that the principle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as a general principle of Community law, a version of it is now enshrined in Article 5 EC. Proportionality can be used to challenge Community antidumping action. The ECJ, however, shows great self-restraint when applying this principle in antidumping cases. From EC case-law,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in this respect.

54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From Employment Repression to Employment Activation

YANG Weiguo SU Jing

Ever since mid-1970s, Europe has suffered from high unemployment rate, which not only severely affected the recovery and the growth of European economy, but